

引用格式：

方方, 王婧, 李裕瑞. 京冀产业协作的过程与机理：基于协同演化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6): 907-916.  
FANG F, WANG J, LI Y R.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6): 907-916.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1190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1190



## 京冀产业协作的过程与机理：基于协同演化视角

方方<sup>1</sup>, 王婧<sup>2\*</sup>, 李裕瑞<sup>3,4</sup>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4.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东西部协作是我国在贫困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探讨京冀地区产业协作的过程与机理，有助于深化扶贫协作理论，为创新协作转型路径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结合京冀产业协作的典型案例分析了产业帮扶过程中京冀产业协作主体间的协同演化过程和互动机理。研究表明：1) 京冀产业协作大致经历了产业合作萌芽期、产业帮扶深化期和产业协作新时期三个阶段；2) 其演化过程包含资源识别与对接、资源整合与应用两个阶段，是京冀政府与企业在协作资源识别、整合与配置以及外部适应能力等方面动态能力提升的过程，推动协作向协同演化方向发展；3) 京冀协同演化的机理表现为优势资源互补为协同演化的资源基础，动态能力提升为协同演化的能力基础，政企双向互动提供外部保障。京冀两地政府与企业主体通过不断协调、反馈与适应性调整，在响应企业需求和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精准决策，优化协作资源配置，使产业协作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产业协作；协同演化；动态能力；资源对接；政企互动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4)06-0907-10

###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

FANG Fang<sup>1</sup>, WANG Jing<sup>2</sup>, LI Yurui<sup>3,4</sup>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East-west cooper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poverty governance,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alyz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this cooperation provides scientific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heories of east-wes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novating its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Using typical case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Hebei,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mong the stakeholders in this collaborative effor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 the embryonic period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the deepening period of industrial assistance, and a new era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2)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is cooperation includes two stag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nection of collaborative resources,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This process enhances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in Beijing and Hebei to identify, integrate, and allocate resources while adapting to external changes, facilitating a shift towards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3)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in thi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s rooted in th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of Beijing and Hebei, which serve as the resource foundation of co-evolution.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parties' dynamic capabilities provides the capability foundation, while two-way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erve as an external support. Through ongoing coordination, feedback, and adaptive adjustments,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entities in Beijing and Hebei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dynamic capabilities, make more precise decisions in response to development needs and external chang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dvance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for poverty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07-30;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11-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2261129477);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智库重大课题(BZK-2023ZD-11)。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2261129477); Major Think Tank Project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ZK-2023ZD-11).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jing@bass.org.cn)

alleviation, showing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Keywords** : east-west cooperatio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o-evolution; dynamic capability; resource dock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interaction

东西部协作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促进东西部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是我国贫困治理、区域协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创新,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sup>[1]</sup>。自 1996 年我国实施东西部协作以来,东部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持续向西部地区转移,不断带动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脱贫、走向小康。当前,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但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成为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影响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脱贫质量与成效<sup>[2]</sup>。随着我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工作重心由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向“以协作促发展”转移。面向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亟待总结提炼东西部协作的运行规律与问题,为探索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的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提供新思路<sup>[3-5]</sup>。

我国实施东西部协作战略 20 多年以来,依托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开展扶贫协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了东西部协作研究。例如,部分研究阐释了扶贫协作的内涵与特征,总结了其历程、政策背景与制度特征<sup>[6-8]</sup>,指出协作对接模式、考核机制、收益分配存在的突出问题<sup>[9-11]</sup>;另一些研究从产业创新、技术转移、社会文化等维度指出扶贫协作的战略方向<sup>[12]</sup>,并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互助合作与跨界治理机制的优化思路等<sup>[13]</sup>。国外学者主要从财政政策、社会资本、金融等视角探索国家减贫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路径<sup>[14-15]</sup>,评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对于改善财力薄弱地区发展的有效性<sup>[16-17]</sup>,测算社会资本、发展基金对贫困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投资等减贫事业的贡献<sup>[18-20]</sup>,探讨现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于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度和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sup>[21]</sup>,以及分税制改革与转移支付的规范化与法制化建设等<sup>[22-23]</sup>。总体来看,我国东西部协作的案例研究较为丰富,涵盖了不同协作领域的经验总结与问题分析<sup>[24]</sup>。然而,新发展阶段对东西部协作的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从主体视角探讨协作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扶贫协作内在机理的研究仍显薄弱,关于如何构建高效的对接机制和更具效率的协作交互模式的深入探讨也较为不足。因此,亟需从主体视角深入剖析东西部

协作的过程与机理,以服务于东西部协作的转型与创新。

东西部协作包含着协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协调、反馈与调整的过程,借鉴协同演化理论,阐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演化过程,将为东西部协作演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京冀协作贯彻东西部协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本研究结合京冀产业协作典型案例,运用案例对比分析法,从主体视角考察产业协作主客体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形成的协同演化关系,归纳提炼东西部协作协同演化的共性规律与转型路径,以期为深化东西部协作与贫困治理理论,探索新发展阶段东西部协作转型与优化路径提供科学参考。

## 1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1.1 协同演化理论

1964 年,生物学家 Ehrlich 和 Raven<sup>[25]</sup>首次提出“协同演化”概念。该概念是指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的物种通过持续变化而形成的相互交织和适应的作用关系,只有决定物种适应性特征变化的关系才能促进协同演化<sup>[26]</sup>,随后,这一理论广泛用于解释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演化。通常认为,协同演化是指在一定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同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各自的演化路径持续互动与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sup>[27-29]</sup>。

协同演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叉理论,强调互动要素或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影响,进而达到更加有序稳定的系统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 动态性。协同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时间跨度。2) 反馈机制。协同演化具有多个明确的实体对象,对象之间、对象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向因果关系。只有对象之间的演化呈现为“强影响”时,才产生协同演化。3) 地理接近性。通常在邻近的地理空间内,多主体的协同演化表现更为显著,但也有学者认为协同演化并不必然发生在同一时空范围内<sup>[30]</sup>。基于协同演化理论探析东西部协作的协同演化规律,能够更清晰地解析施援地(东部地区)与受援地(西部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协同演化过程。这对拓展东西部协作理论内涵,探讨其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 1.2 研究方法思路框架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东西部协作的演化

过程。案例研究基于多种数据资料整理,深度挖掘研究对象的背景、过程与效果,并对其进行解析、判断或预测。该方法侧重于解释“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能够更深入地阐释东西部协作的协同演化过程与交互关系。

将东部、西部地区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具有东西部协作目标的一致性,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东西部协作的演化是基于不同的东西部协作目标,由施援地向受援地科学配置必要的东西部资源,并通过两地之间不断反馈与调整,使有限的东西部资源发挥最优效用。基于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典型东西部协作领域,从三个层次对东西部协作的演化过程与协同机理进行剖析:1)演化历程分析。分析案例区东西部协作的演化历程,总体评判不同阶段东西部协作的阶段特征;2)路径解析。解析东西部协作协同演化的路径,重点解析协作主客体之间的对接过程与动态能力、东西部资源整合过程以及协同演化的关键节点,探索主客体之间东西部协作的作用与反馈机制;3)机理探析。揭示东西部协作的协同演化机理,分析影响协同演化的因素及其影响路径,探讨协同演化的制约因素,并提出高效协同的调控路径。

### 1.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的东西部协作案例区域为北京市14个区及其对口帮扶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地区(以下称张承保地区)的23个贫困县。自2015年京冀两地明确帮扶合作框架体系后,京冀扶贫协作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合作、生态环保、劳务输出等领域的协作任务有序开展,目前已形成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多元化帮扶模式。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北京市区级财政资金援助河北总额近2亿元,援助项目230余项,直接带动上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自京冀扶贫协作实施以来,张承保地区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截至2020年2月底,北京对口帮扶的23个贫困县(区)已全面脱贫摘帽。

产业帮扶在东西部协作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与带动作用,选取京冀产业协作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能够更好地刻画扶贫协作的协同演化过程与机理。2019—2022年,课题组对张承保地区的阜平、涞源、涞水、丰宁、滦平、蔚县、尚义、宣化等8个受援区县进行实地调研,通过政府部门座谈、企业考察、电话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具体包括:1)政府部门座谈。通过对口帮扶区县扶贫部

门举办座谈会,了解北京对口帮扶协作的历程、对接流程、帮扶内容、特色与成效;听取对口支援干部对两地帮扶工作的感性认知,了解两地产业协作对接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需改进的地方。2)企业考察。由受援地扶贫部门推荐当地产业扶贫协作的典型企业案例,对案例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整理企业发展、带贫益贫等相关数据资料;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和电话沟通等方式,探讨北京帮扶要素如何介入企业产业链,发挥帮扶效应,了解北京扶贫协作对被帮扶企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以及脱贫后企业利用北京帮扶资源的未来发展设想。

遵循典型性和差异性原则,抽取不同类型的产业协作项目案例,最终选取了张承保地区6个企业作为京冀产业协作的典型案列。在案例选取上,考虑产业类型差异,分别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农业、加工业和工业园区等不同类型的;依据帮扶实施成效,选取了实施效果较好和一般的项目案例。依据帮扶要素投入模式差异,分别选取了共建园区型、直接援助型和直接投资型三类案例。共建园区型以园区为载体,由北京与受援地开展园区合作、共同运营;直接援助型由北京各部门、企业等主体对受援地企业直接提供资金、人才、销售渠道等援助要素;直接投资型由北京企业在受援地直接开展投资建设。企业案例的特征描述如表1所示。

## 2 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 2.1 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阶段

依据不同时期产业协作的帮扶主体、帮扶政策与帮扶力度的差异,将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表2):

1)产业合作萌芽期(2015年以前)。受空间邻近性的影响,京冀两地产业互动交流由来已久。2015年以前,一些北京企业由于自身产业发展需求,向河北张承保地区进行产业链转移,或直接进行产业投资,支持河北地区产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京冀产业互动以民间的、自发性的产业合作交流为主要形式,缺乏系统性和规模性的产业帮扶行为。参与主体以北京的少量企业为主,政府层面的产业交流互动较少,总体上处于京冀产业合作的萌发阶段,产业合作与关联性相对较弱。

2)产业帮扶深化期(2016—2020年)。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同签署《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环京津相关地区工作方案》,初步确定了京冀之间帮扶关系与帮扶领域。



表 1 选取的帮扶案例企业及其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ed enterprises for case study

模式	对象	产业类型	启动时间	案例名称	帮扶内容	实施成效	
						帮扶要素投入	帮扶成效
共建园区型	北京怀柔-河北丰宁	工业园区	2017年	丰宁县怀丰产业园	北京怀柔与河北丰宁共同建设怀丰产业园,从北京怀柔引进汽车配件企业进驻产业园	引进北京怀柔近 20 家汽车配件公司。	园区营业收入 3.6 亿元,实现税收 1 000 万元,吸纳就业人数超过 1 000 人。
	北京密云-河北蔚县	农业	2019年	蔚县 K 养殖公司油鸡养殖	北京密云 B 养殖销售公司在油鸡养殖、销售等环节对蔚县 K 养殖公司提供帮扶	蔚县 K 养殖公司借助养殖技术与销售渠道,养殖 3 万只油鸡。	带动蔚县 107 户 298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增收。
直接援助型	北京昌平-河北尚义	加工业	2019年	尚义县 J 农产品加工公司消费扶贫	北京昌平通过推广展销、合作直销、单位助销等方式,帮扶尚义 J 公司销售农产品	北京昌平某商城与河北尚义 J 农产品加工公司签订产品订单 30 万元/年。	带动尚义 2 800 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增收。
	北京密云-河北滦平	农业	2019年	滦平县 X 香菇种植	北京密云对河北滦平 X 香菇种植基地提供资金帮扶,用于基地改造升级	利用密云帮扶资金 1 423 万元建设 38 栋微型菇房。	直接带动 114 户贫困户参与生产经营,户均增收 4 万元,受益贫困人口 374 人。
	北京密云-河北滦平	加工业	2019年	滦平县 L 食品加工	北京密云对河北滦平 L 食品加工企业提供资金帮扶,提升企业运营能力	河北滦平整合北京密云帮扶资金在内的扶贫资金 2102.3 万元入股 L 食品加工企业,以每年不低于入股总额的 10% 的比例保底分红。	带动滦平 2 047 户贫困户就业,年均增收 3.6 万元/人。
直接投资型	北京昌平-河北尚义	农业	2018年	尚义县 D 草莓种植公司草莓基地建设	北京昌平 D 草莓种植公司在河北尚义投资建设草莓种苗繁育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尚义农业发展	投资草莓种苗繁育现代农业产业园,土地流转面积达 20 hm <sup>2</sup> 。	带动尚义 2 98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吸纳 200 人就业,年均增收 6 000 元/人。

表 2 京冀产业协作演化的阶段性特征

Table 2 Main pha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时间	阶段	任务要点	主体行为	政策支持	帮扶模式
2015 年以前	产业合作萌芽期	拓展企业自身发展空间。	北京企业的自发性行为。	缺少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	以北京企业在河北直接投资为主。
2016—2020 年	产业帮扶深化期	助力受援地构建产业体系;构建产业帮扶对接机制。	政府搭建产业扶贫协作平台,企业开展产业帮扶活动。	扶贫协作行动框架协议、实施方案等。	多元化产业帮扶模式;多样化要素投入。
2020 年至今	产业协作新时期	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转型;产业协作向深层次转变。	政府搭建协作平台,企业之间开展深层次协作。	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协同规划政策。	巩固产业帮扶成果与防返贫;产业协同布局。

随后,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全面深化京冀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北京 13 个区与河北张承保地区的 16 个县(区)的结对帮扶关系,并加强双方多领域帮扶协作。为助力河北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 年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全面深化京冀扶贫协作工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重新调整了京冀结对帮扶关系,由北京 14 个区帮扶河北张承保地区的 23 个贫困县,明确了北京帮扶张承保地区构建脱贫产业体系、开展企业投资、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等重点任务,开启了京冀产业协作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京冀政府搭建产业协作平台,引导两地企业主体开展产业交流与帮扶活动,产业帮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产业对接机制逐步健全,产业帮扶模式趋于多元化,带动张承保贫困县的脱贫成效显著。

3) 产业协作新时期(2020 年至今)。随着北京帮扶张承保贫困县实现全面脱贫,京冀产业协作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同时也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京冀产业帮扶逐渐向产业协作转型。2018 年 7 月,北京市发改委发

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强化北京与津冀产业对接与协作,明确三地产业功能定位;2018 年 12 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共同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2018—2020 年)》,2023 年 11 月,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了《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旨在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在京津冀产业协同与协同创新的系列政策支持下,未来围绕京津冀协同与高质量发展目标,京冀产业协作预计将加快推进,两地企业交流协作有望不断深化,产业关联效应将更加紧密,产业协作带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模式将更趋于多元化。

## 2.2 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过程

2.2.1 产业协作的对接过程及其特征 京冀产业帮扶深化期(2016—2020 年)涵盖了京冀产业协作的全过程,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根据京冀两地产业扶贫协作的对接流程,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图 1)。

1) 协作资源的识别与对接阶段。在这一阶段, 施援地与受援地的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产业协作信息的双向反馈与对接, 为协作资源的整合与配用提供前提。从受援地视角看, 受援地企业主体提出具体协作需求, 受援地政府部门统计汇总协作要素, 并报送至施援地相关政府部门审核, 形成了“受援地企业 - 受援地政府部门 - 施援地政府部门”多主体的对接模式; 从施援地视角看, 施援地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产业协作项目储备库, 并从项目库中筛选有意愿到受援地投资的企业, 搭建帮扶企业与受援地相关政府部门的对接渠道, 形成了“施援地政府 - 施援地企业 - 受援地政府部门”的多主体对接, 由京冀双方各区县政府共同构建对口帮扶合作框架, 并结合双方的产业需求, 初步达成对产业协作内容与形式的共识。不同帮扶模式在协作政策框架、识别的资源要素和协作主体上各有侧重 (表 3)。

2) 协作资源的整合与配用阶段。在这一阶段, 施受双方依据施援地的资源优势与受援地的企业需求, 对协作资源整合过程进行适应性调整。本质上是通过双方资源共享与协作资源的再配置, 助力受援地培育构建产业体系。在协作资源整合过程中, 借助于产业帮扶平台, 施援地企业选取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营销等较具优势的协作要素, 向受援地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受援地企业通过整合协作资源与有效信息, 及时调整自身产品生产与供给, 进行产品拓展、供应链整合与组织结构优化, 从而提升竞争力。结合典型案例, 共建园区型、直接援助型和直接投资型三类帮扶模式在这一阶段的共性特征为企业园区负责人或对口帮扶的挂职干部挖掘两地的比较优势资源, 主动对接企业资源, 为施援地的援助资源顺利进入受援地提供了必要的协助, 实现两地资源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 (表 3)。不同帮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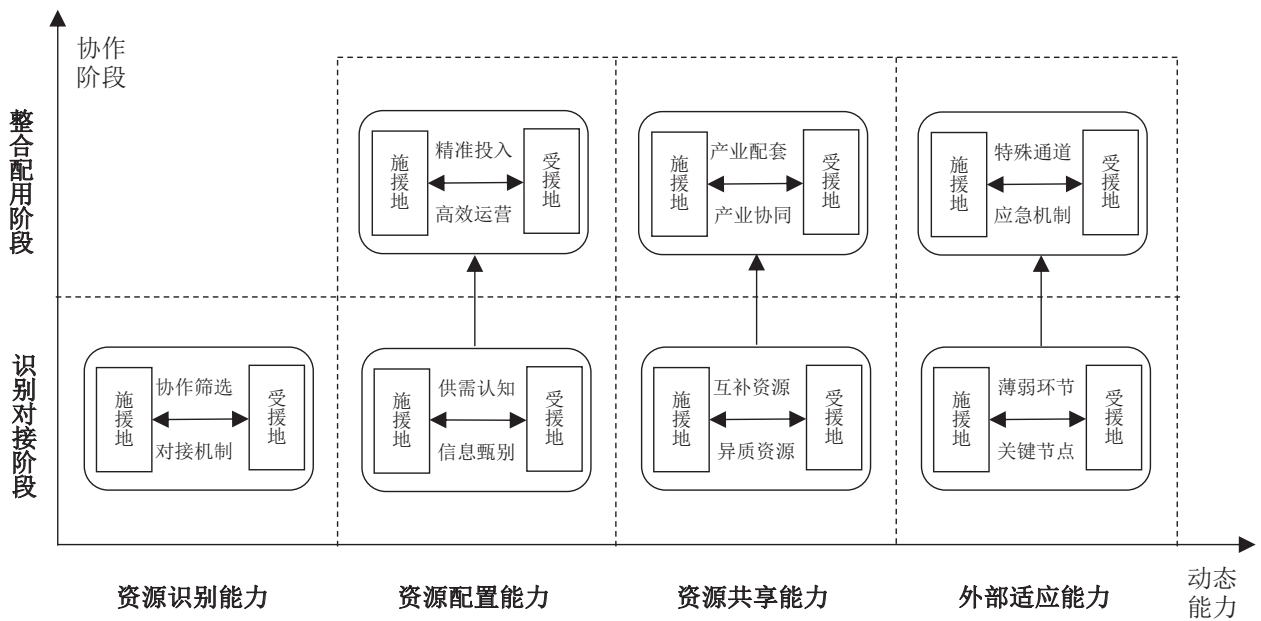


图 1 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过程

Fig. 1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表 3 京冀产业协作资源对接过程的案例对比

Table 3 Case comparison of dock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resources of Beijing and Hebei

帮扶模式	案例名称	识别与对接阶段	整合与配用阶段
共建园区型	丰宁县怀丰产业园	1) 政府对接。北京怀柔与河北丰宁签订对口帮扶合作框架, 共同规划建设怀丰产业园; 2) 企业对接。明确怀丰产业园承接怀柔汽车配件企业疏解的功能定位与任务要求。	1) 资源整合。北京挂职干部主动对接怀柔汽车配件企业, 协助将怀柔部分汽车企业引进怀丰产业园; 2) 政策支持。河北丰宁出台制定《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外迁企业优惠政策》等文件, 为怀柔企业提供土地供应、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直接援助型	蔚县 K 养殖公司油鸡养殖	1) 政府对接。北京密云与河北蔚县签订对口帮扶合作框架; 2) 项目谋划。双方谋划农业帮扶项目, 拟引进北京农业企业帮扶蔚县农业发展。	1) 资源整合。北京挂职干部借助原工作单位资源, 促成密云 B 养殖销售公司与蔚县 K 养殖公司之间的合作; 2) 资源配用。由密云 B 公司向蔚县 K 公司提供养殖技术, 收购油鸡产品。
直接投资型	尚义县 D 草莓种植公司草莓基地建设	1) 政府对接。北京昌平与河北尚义签订对口帮扶合作框架; 2) 项目谋划。双方谋划农业帮扶项目, 引导北京农业企业在尚义投资建设。	1) 资源整合。北京昌平 D 草莓种植公司对接尚义农业部门, 在尚义开展农业投资建设; 2) 资源配用。昌平 D 公司利用当地高寒气候等稀缺性资源优势, 建设草莓种植繁育基地。

模式对资源的整合与配用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共建园区型在明确各自权责界限的基础上开展产业合作;直接援助型着重解决被帮扶企业经营面临的突出困难,由施援地为其提供精准的协助;直接投资型是施援地企业基于充分的市场调研,参与受援地产业链全过程开发与建设(表3)。

2.2.2 政企动态能力提升过程及其特征 动态能力是指京冀双方政府与企业主体有效整合、再配置协作资源的能力<sup>[31]</sup>。京冀产业协作演化过程表现为协作主客体动态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推动着产业扶贫协作朝着协同演化的方向发展(图1)。

1) 资源要素识别与配置能力。结合企业案例来看,受援地产业发展普遍存在着资金缺乏、营销渠道不通畅、技术创新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等短板。协作主客体的资源识别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与资源共享能力等动态能力对产业协作产生了不同的贡献与影响。其中,协作资源的识别能力是指双方对协作资源需求与供给的认知水平。河北受援地的识别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筛选出迫切需要且能从施援地获取的资源类型,而北京施援地的识别能力则决定其是否了解受援地被帮扶企业的真实需求。资源配置能力侧重于对两地供需资源的识别与信息甄别,影响受援地是否能高效地将获取的协作资源要素投入产业链的各个需求环节;资源共享能力则注重互补异质资源的识别,能力越强,双方对互补性资源的配置越高效。

施受双方识别出最具价值且最急需的协作资源,通过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不断协调与反馈,形成两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这是协作资源识别与配置的核心。在实际协作过程中,受援地的资源需求与施援地的资源供给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偏差,可能导致协作资源供需不匹配,根源在于双方对资源供需认知存在差异。产业帮扶深化期的早期,由于两地资源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资源要素识别与配置能力相对有限,可能导致施援地提供的资源并非受援地迫切需要或稀缺的资源,或受援地急需的资源缺乏畅通的传递渠道,由于两地投资政策信息不对称,导致受援地引进施援地企业时“水土不服”。例如,北京昌平D草莓种植公司在河北考察投资时,未充分评估京冀两地农业补贴政策的差异,影响了投资企业的收益和后续扶贫成效;京冀共建园区建设初期,双方对各自权责利的认知不明确,园区管理运营机制不健全,从而对企业入驻和园区运营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双方互动交流的不断增强,资源识别与配

置能力也在提升。依据施援地的资源优势与受援地企业的实际需求,双方不断调整协作要素与援助内容,明确双方权责利,探索构建高效的产业协作模式,以充分发挥两地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合作的相互渗透。在密云帮扶蔚县油鸡养殖产业发展中,北京企业通过共享市场信息、采用订单形式,促使被帮扶企业将养殖产品调整为北京消费需求较大的油鸡品种;承德滦平X香菇基地利用帮扶资金改造四季出菇棚,实现北方四季出菇,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逐步将销售市场扩大至华北地区。随着协作交互程度的不断加深,北京施援地对尚义J农产品加工公司和滦平L食品加工企业等加工类企业的帮扶,从单一的生产、销售环节或资金帮扶,转变为对产业链的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市场营销等全过程的帮扶。这些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结合北京消费者的反馈,不断调整产品包装尺寸、食品口味等设计,以更好地适应北京消费需求,并依托北京将消费市场扩展到全国,产业帮扶模式趋于多元化,受益程度更为深远。

2) 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受援地产业普遍存在市场适应性较弱、抗风险能力不足等特征,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总体较弱。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更依赖外部帮扶力量,需要对受援地企业的薄弱环节与关键节点进行精准识别与介入。例如,北京各区通过设立扶贫专柜等方式,帮助尚义J农产品加工公司等农业企业销售特色农产品,这种特殊的销售渠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竞争带来的营销风险,有利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实现快速持续成长。外部帮扶作为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旨在帮助企业更快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企业形成与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受援地产业体系培育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目前京冀两地已初步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体现为施受双方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及时调整人员、资金等要素配置,迅速应对突发事件的影响。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发导致暂时停工停产,可能拖延河北张承保地区的脱贫进度。对此,京冀政府通过科学评估停工停产对河北受援地企业的影响,特别关注能否按期脱贫的企业,迅速采取简化审批流程、调整帮扶资金配置、为进京农产品开通“绿色通道”等非常规措施,加快产业协作要素资源的供给,有效降低疫情对受援地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综上,协作资源的识别、整合与配置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构成了政府与企业主体的动态能力,成为影响京冀产业协作演化发展的关键。



京冀双方动态能力的提升贯穿于协作演化的全过程，通过政府与企业主体之间的不断协调与反馈，有效提升了产业帮扶效率与企业市场竞争力，为京冀产业协作的协同演化奠定了基础。

### 2.3 产业协作的协同演化机理

京冀产业协作的协同演化是两地通过提升产业扶贫的动态能力，依据企业发展需求与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精准决策，以优化协作要素配置的过程。基于实地调研与理论分析，归纳的协同演化机理如图 2 所示。

2.3.1 两地优势资源互补是推动产业协作协同演化的资源基础 京冀两地的优势资源具有互补性，产业扶贫协作使双方获得异质性或稀缺性资源，在两地之间实现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为京冀产业扶贫协同演化奠定了资源基础。良性且可持续的产业协作模式是两地双向互动的结果，依托京冀产业协作平台提供的产业技术、市场等信息共享，双方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促进潜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高效利用，从而形成产业协作的协同效应。在产业扶贫协作深化的初期，两地协作开发同质性资源的难度相对较低。北京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通过扶贫专柜、定点采购等渠道有效解决受援地扶贫产品的销售问题。由于河北受援地的同质性资源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随着北京消费市场对多样化产品需

求的不断提升，从培育壮大受援地产业体系的角度，开发两地的差异性或互补性资源、挖掘两地互补资源优势，更有助于提升产业协作的协同效应。

随着产业协作的不断深入，双方对对方的产业资源禀赋与自身产业要素需求的认知逐渐清晰。施援地的企业更倾向于在受援地寻求互补性资源或产业互补性较强的合作对象。产业要素援助逐渐从一般性资源转向更高价值且稀缺的资源，推动产业扶贫协作向深层次演化，实现资源互补、整合与对接。例如，在昌平帮扶尚义投资建设 D 草莓种植产业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当地气候等稀缺性资源优势，从单一提供资金帮扶转变为依托高寒气候资源建设育苗基地。这不仅促进了当地农民的脱贫与就业增收，同时也满足了 D 草莓种植公司在北京周边地区就近建设草莓育苗基地的需求，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当前，产业扶贫协作作为一种不完全市场行为，受援地的产业发展仍较为依赖施援地的要素投入，对异质性、互补性协作资源的挖掘尚不充分，产业关联效应较弱，资源共享与产业互动能力相对不足。未来，面向京冀产业高质量协同与提升受援地产业体系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亟需深入挖掘协作主体精准识别与评估资源优势互补的潜力，持续提升资源互补优势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着重推进京冀产业链一体化与产业优势互补，构建稳定、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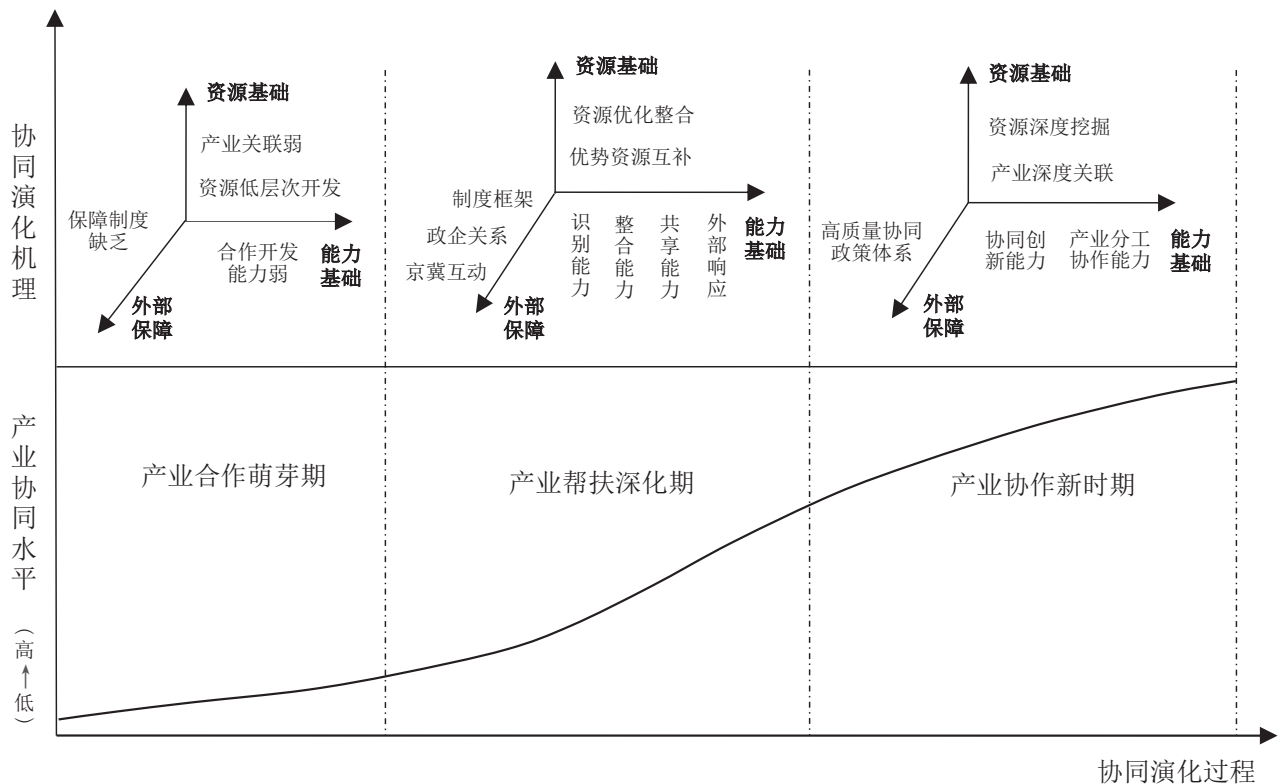


图 2 京冀产业协作的协同演化机理

Fig. 2 Synerget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 and Hebei

续的京冀产业链分工体系。

2.3.2 双方动态能力提升是推动产业协作协同演化的能力基础 京冀双方通过适应性调整,持续提升自身的动态能力,构建高效的产业扶贫协作机制,形成推动产业协作协同演化的能力基础。

1) 京冀双方对互补性与异质性协作资源的识别能力,有助于筛选适合的最优协作资源,推动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受援地可根据施援地的资源比较优势调整自身资源需求,施援地则可根据自身资源存量与受援地的资源需求,适时调整协作资源供给,不断提升双方协作资源供需的匹配程度,提高产业帮扶项目的成功率。例如,在滦平的 L 食品加工帮扶中,企业借助北京平台资源,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对休闲食品的消费需求,不断从供给侧对食品口味和类型进行适应性调整,更好地对接北京巨大的消费市场。在此过程中,企业因掌握了更精准的市场信息与规律,产品适配度不断增强,生产与经营能力得以提升,同时,北京作为施援方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提供具体帮扶方案,精准帮扶能力也随之提升。

2) 京冀对协作资源的整合能力推动着资源的协同配置与优化布局。随着协作要素流动方式由施援地要素投入主导向双向流动转化,受援地开始探索为北京产业链上下游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撑,不断提升产业协作参与程度与产业链协同程度,创新双方资源共享的协作模式,为未来京冀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京冀的地理邻近性有利于产业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为未来形成空间相邻、集约高效的京冀产业一体化布局提供了可能。

3) 京冀两地政府、企业等协作的主要参与者建立一套快速反馈与响应机制,提升外部适应能力,双方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动态调整帮扶策略与运作模式,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对协作的不利影响,有效提升了协作演化的稳定性与协同性。

2.3.3 政府与企业的双向互动是产业协作协同演化的外部保障 良好的政企关系影响着产业协作的广度与深度,为产业协作提供了更广泛的帮扶资源与较为完善的外部保障。京冀政府与企业的双向互动既包括两地政府层面的交流与反馈,也包括两地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政府层面构建的京冀扶贫协作框架与协议,为各类帮扶主体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制度基础;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京冀两地政府通过精准识别产业协作资源优势,共同谋划帮扶产业项目,甄别不同受援地适宜开展的产业项目类型,分析受援地企业的资源短板与协作需求,精准向受

援地企业提供所需的资源要素。

1) 在产业帮扶深化的初期,由于产业协作需求不明确,双方优势资源的认知不清晰,产业协作的进度总体较缓。随着两地部门之间的磨合,双方对自身需求与对方优势的认知逐步明晰,协作对接机制不断畅通,为协作资源要素的顺利流动提供了保障。例如,在蔚县油鸡养殖项目中,北京挂职干部利用原单位的农业资源,甄选了油鸡品种以帮助受援地发展农业养殖。通过两地扶贫部门人员与挂职干部的协作,促进了受援地油鸡养殖产业的发展,并为北京更多优秀企业与技术等资源进入蔚县搭建了协作通道。

2) 在产业帮扶深化的中后期,随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对接能力及对外部市场与政策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不断提升,双方政企双向互动程度逐步加深,并建立了精准化、可持续的产业帮扶体系与扶贫对接机制,构建了支持受援地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服务体系。在这些政策体系的支撑下,基于前期帮扶企业的示范效应,京冀两地企业层面的互动不断加深,北京企业参与受援地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持续增强,为后续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以及两地产业链合作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京冀产业协作呈现出渐进式的协同演化过程。在产业合作萌芽期,由于双方对资源的认知能力相对较弱,资源整合与配置能力欠缺,产业关联度较低,因此两地产业帮扶的协同效应较弱。进入产业帮扶深化期,随着双方交互关系的不断加深,依托互补资源优势、动态能力提升和政企互动的推动,京冀双方通过不断反馈与适应性调整,建立了产业共生演化的关系,协同水平迅速提升。在产业协作新时期,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的政策体系下,两地对稀缺与互补资源的深度挖掘将进一步加深产业关联程度,增强协同创新与产业分工协作能力,引领京冀产业协作达到新高度,协同水平达到最高峰(图 2)。在这一过程中,京冀互补资源优势为产业资源的整合与对接奠定了基础,双方动态能力的提升推动了协作资源供需匹配程度的不断提高。良性的政企双向互动为产业协作提供了完善的外部保障机制,京冀政府与企业主体之间通过适应性调整,持续提升动态能力,促进协作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京冀产业帮扶的协同效应不断增强。

###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3.1 结论

1) 本文划分了京冀产业协作的演化阶段,从



扶贫协作对接与政企动态能力的视角揭示演化过程。根据产业协作主体、政策及力度的差异, 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产业合作萌芽期(2015年以前)、产业帮扶深化期(2016—2020年)和产业协作新时期(2020年至今)。协作对接过程分为资源识别与对接、资源整合与配用两个阶段。动态能力是双方有效整合与再配置协作资源的能力, 包括资源识别、配置、共享及环境适应等方面, 其不断提升是京冀产业协作演化的重要表现。

2) 探析了京冀产业协作的协同演化机理。京冀优势资源互补是协同演化的资源基础, 双方动态能力的提升构成了协同演化的能力基础, 而政企的双向互动则是协同演化的外部保障。在京冀产业协作过程中, 双方通过不断互动反馈与适应性调整, 产业扶贫协作的动态能力得以持续提升。基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与外部环境变化, 双方能够做出更精准且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决策判断, 从而促进协作要素在两地之间的优化配置, 推动京冀产业协作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

### 3.2 政策建议

进入新发展阶段, 东西部协作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愈加重要, 未来亟待挖掘京冀产业协作潜力, 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的的东西部产业协作大格局。

1) 强化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探索创新路径。制定京冀高质量协作的战略规划, 明确各阶段的任务目标, 培育具有区位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完善产业转移所需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政策配套; 将京冀协作打造成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示范区, 并探索在高质量对接、区域融合与共同富裕等领域的创新路径。

2) 高标准推进乡村产业帮扶, 构建资源互补、特色突出的协作格局。充分利用京冀资源互补优势, 甄选具有长效和增收带动效应的帮扶项目, 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借助京冀协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以品牌化、标准化和集群化理念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试点探索乡村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

3) 优化协作机制, 创新合作模式。根据不同产业需求, 探索政企合作或企业间合作, 推动协作高效对接, 强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政策支持; 完善适应东西部协作转型的制度化建设, 创新协作绩效评价体系, 促进京冀协作在新发展阶段的长效发展。

#### 参考文献:

[1] 吴国宝. 东西部扶贫协作困境及其破解[J]. 改革, 2017(8): 57-61.

- WU G B. The dilemm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its solution measures[J]. Reform, 2017(8): 57-61.
- [2] 方方, 李裕瑞.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J]. 经济地理, 2022, 42(4): 8-18.
- FANG F, LI Y R. Assessing the difficulty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key assistance counties in Wester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4): 8-18.
- [3] 庄晋财, 黄曼. 论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4): 549-556.
- ZHUANG J C, HUANG M.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4): 549-556.
- [4] 刘彦随, 龙花楼, 李裕瑞. 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与人文地理学研究[J]. 地理学报, 2021, 76(12): 2869-2884.
- LIU Y S, LONG H L, LI Y R.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thinking of global rural-urban relationship[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2): 2869-2884.
- [5] 龙花楼, 陈坤秋.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研究框架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21, 41(8): 1-9.
- LONG H L, CHEN K Q. Realizing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8): 1-9.
- [6] 谭雪兰, 蒋凌霄, 王振凯, 等. 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贫困: 源起、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913-923.
- TAN X L, JIANG L X, WANG Z K, et al. Rural pover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origin, progress, and prospect[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13-923.
- [7] 王禹瀚.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 成就、经验与价值[J]. 管理世界, 2022, 38(4): 71-85.
- WANG Y H. The paired aiding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valu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4): 71-85.
- [8] 李勇. 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的政策背景及效果分析[J]. 老区建设, 2011(14): 33-36.
- LI Y. Policy background and effect analysis of China's East-West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J]. Lao Qu Jian She, 2011(14): 33-36.
- [9] 程世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大格局内生性扶贫模式建构[J]. 湖北社会科学, 2018(11): 26-31.
- CHENG S 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iochem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the big pattern[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18(11): 26-31.
- [10] 韩广富, 周耕. 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回顾与思考[J]. 理论学刊, 2014(7): 34-38.
- HAN G F, ZHOU G.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J]. Theory Journal, 2014(7): 34-38.
- [11] 李小云.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四维考量[J]. 改革, 2017(8): 61-64.
- LI X Y. Four-dimensional conside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 and counterpart suppor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J]. Reform, 2017(8): 61-64.
- [12] 方珂, 蒋卓余. 东西协作扶贫的制度特点与关键问题[J]. 学习

- 与实践, 2018(10): 105-113.
- FANG K, JIANG Z Y. Local reciprocity guided by the state: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ssues of East-West collabor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J]. Study and Practice, 2018(10): 105-113.
- [13] 王晓伟, 戈大专. 山东省旅游扶贫村发展困境与路径分析: 以典型案例村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5): 728-735.
- WANG X W, GE D Z. The challe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typic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9, 40(5): 728-735.
- [14] FOSU A K.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 global evidence[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7, 71(2): 306-336.
- [15] CIRERA X, MASON A D, NICOLA F D, et al. The innovation imperative for developing East Asia[M].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1: 81-139.
- [16] KEVIN C, LUDWIG S. The effect of elevating 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on government program eligibility and spend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24, 24(1): 301-327.
- [17] JATTA S. Non-farm wag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 Munich: Mpra Paper, 2013: 2-10.
- [18] NZASABAYEZU O, PRAKASH S K J, RAMA P M V. A stud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J]. Heliyon, 2024, 13(10): 1-21.
- [19] SUWANDI.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 invest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Fak, Fak District, West Papua Indonesia[J]. IOSR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OSR-JEF), 2016, 7(3): 69-72.
- [20] ABRO Z A, ALEMU B A, HANJRA M A.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Ethiop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9: 461-474.
- [21] LUSTIG N. Fiscal policy,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R]. Washington, D C: Commitment to Equity Working Paper, 2017: 1-36.
- [22] BOATENG G O, BOATENG A A, BAMPOE H S.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Ghana: evidence from policy beneficiaries[J]. Review of Business & Finance Studies, 2015(6): 99-108.
- [23] NOORDWIJK V M. Integrat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s pathway to poverty reduction: innovating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19, 172: 60-71.
- [24] 王燕, 刘晗, 赵连明, 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J]. 管理世界, 2018, 34(6): 12-23.
- WANG Y, LIU H, ZHAO L M, et al. Pattern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6): 12-23.
- [25] EHRLICH P R, RAVEN P H. Butterflies and plants: a study in coevolution[J]. Evolution, 1964, 18(4): 586-608.
- [26] HODGSON G 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12(3): 259-281.
- [27] 肖静华, 吴瑶, 刘意, 等. 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的研发创新: 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的双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8): 154-173, 192.
- XIAO J H, WU Y, LIU Y, et a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novation with customer digitalized engagement: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from the firm-customer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8): 154-173, 192.
- [28] 李煜华, 向子威, 胡瑶瑛, 等.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先进制造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研究: 基于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J]. 管理现代化, 2022, 42(1): 81-86.
- LI Y H, XIANG Z W, HU Y Y, et al. Research on the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firm-customer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22, 42(1): 81-86.
- [29] SCHNEIDER S. How to approac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portunities in times of (no) exogenous change[J]. R & D Management, 2019, 49(4): 399-420.
- [30] 王烽权, 江积海. 跨越鸿沟: 新经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闭环的构建机理: 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协同演化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3, 26(1): 195-205.
- WANG F Q, JIANG J H. Crossing the chasm: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business model loop for new economy startups: a multi-case study from the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capture[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23, 26(1): 195-205.
- [31] JENSEN J A, COBBS J B, TURNER B A. Evaluating sponsorship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resource-based view: the potential for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Business Horizons, 2016, 59(2): 163-173.

(责任编辑: 孟岑)